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5.03.001

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与应对措施

王 庆

(兰州商学院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201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阐释了经济新常态的九大特征,其中包括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后的经济风险积累问题。这些累积的经济风险主要有能源、安全、货币和信息方面的国际风险以及周期性、调整性、环境和债务方面的国内风险,它们具有国际风险影响越来越大、风险系统性发展但总体可控的表现特征。防范并化解上述风险,需要采取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加快结构调整、增进国际合作和融合经济增长与公共伦理建设等措施。

关键词:宏观经济;经济新常态;经济风险

中图分类号:F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5)03-0005-06

一、引言

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宏观经济作出了从高位下行至中位的新常态判断,并首次提出经济新常态的九大特征,其中对经济风险的看法是,伴随经济增速下行,各类隐性风险将会逐步显性化。与此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也将中国经济增长下调至7%,同时指出世界经济复苏之路并不均衡,如今又面临着过度风险和地缘政治威胁。可以说,在现代信息社会下,经济增长与经济风险间有一种简单的逻辑关系:当经济高速增长时,各种利好消息会使公众主观忽略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各种风险;而当经济增长趋缓时,各种唱衰消息又会使公众主观放大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各种风险。以世界经济为例,自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运行呈现波动中下行的态势,相应地,油价下跌、经济制裁、贸易纠纷等众多经济风险凸显,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故在此背景下,当我国经济增速由2007年的14.2%滑落至2014年的7.4%,并有可能自2015年后稳定在7%左右时,将会面临哪些风险,继而对宏观经济运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就成为亟需认识并加以防范的问题。

二、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

对于我国宏观经济未来的发展,中央有清晰的认识,经济新常态就强调了宏观经济中位增长与结构调整长期并存的格局,而要实现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在7%左右增长,就要梳理好宏观经济增长中面临的各种风险。考虑到我国宏观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这些风险大体上可分为国际风险和国内风险两大类。

(一)国际风险

从国际角度看,中国经济无论总量还是增长率都是世界经济发展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这也意味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所引发的风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具体来讲,这些风险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1. 能源风险。2004年中国48%的石油依靠进口,2014年这一数值已上升至60%。除了可供进口的石油储量值得担心外,石油进口还受到国际油价变动的影响。2004年7月初,国际油价每桶约40美元,2008年7月中旬,每桶已涨到156美元。进入2014年底,国际油价又突然暴跌,截至2015年1月底,国际油价已跌至每桶47美元左右。当然,短期内

收稿日期:2015-04-07

作者简介:王庆(1977-),男,甘肃山丹人,兰州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

看,作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国际油价暴跌大大降低了我国进口石油的成本,但从长期来看,石油价格的频繁波动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则是不确定因素。以此次油价暴跌为例,其中既涉及供需面变动和美俄、沙特与伊朗之争,又涉及传统产油国与美国新兴页岩油产业之争,这意味着未来我国要面对的国际油价依然是不确定的。也正因为如此,蓝普顿提到了我国用于克服能源依赖这一弱点的多头战略,包括中国与任何一个拥有地下能源的国家交朋友,尽量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尽可能建立稳定的供给和价格关系,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增加能源效率,运送模式多元化和扩大海军等,^{[1](P205)}以期降低我国所面临的能源风险。

2. 安全风险。2014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指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这又掀起了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威胁论”就一直未曾中断过,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以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威胁到其霸权安全。对这一点,黄树东在描述美国霸权体系中的中国位置时谈到:“美国政府和智囊在许多文件中明白无误地指出,要把中国纳入能保障美国利益的格局里……这就必须做到三点:第一,使中国经济依赖美国,至少是依赖美国市场;第二,必须使中国经济走上低技术水平扩张的道路;第三,必须在金融上控制中国”。^{[2](P2)}故从经济安全角度看,美国的霸权主义一方面易造成中美间的经济摩擦甚至对抗,如日益加剧的中美反倾销案、美国主导的排除中国在外 TPP 谈判等;另一方面美国霸权主义与全球多元化之间的内在矛盾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也给我国的对外经济带来了更多风险。

3. 货币风险。货币作为商品交易的媒介,在现代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现代自由贸易扩张带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经济货币化,这使一国货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将决定该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因此,美国霸权主义的核心之一就是保持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进而保证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这一传导机制突出表现在:一是美国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在对外贸易中掠夺他国财富;二是美国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竭力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并将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三是美国大力推行“债务经济”,使国内借贷消费成为

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四是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频繁利用货币贬值来转嫁自身危机。^[3]不过,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提升,人民币在更广的范围内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已成必然,2014年人民币直兑新西兰元和韩元就是例证。但这也令美国以为人民币会对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构成挑战,对人民币的干扰打压态势自然增强,这对货物进出口总额和外汇储备均为世界第一的我国来说,无疑带来了很大的货币风险。

4. 信息风险。现代经济本质上也是信息经济,一方面,信息本身成为商品,并在互联网的帮助下迅速商业化;另一方面,信息的变动可对宏观经济产生难以低估的影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美欧等发达国家对信息安全高度关注,但同时也开始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来进行干预甚至攻击经济体。2014年底,朝鲜网络全面瘫痪,这是第一次对一个国家整体网络的安全攻击。对我国而言,作为世界上重要的信息化大国和网络大国,同时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防范的主要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信息风险将会越来越大,这是因为:一是西方国家将我国树为网络公敌,并进一步加强针对我国的网络遏制行为;二是贸易保护“安全壁垒”被广泛使用,尤其是西方各国普遍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来打压我国信息技术产业;三是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应用日趋深入,信息威胁将更加突出。

(二) 国内风险

从国内来看,三十多年的高经济增长给我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也产生了许多潜在风险,其中对未来宏观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风险有:

1. 周期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波动,依次为:1979—1981年间,GDP增长率由7.6%上行至7.8%,又下行至5.2%;1981—1986年间,GDP增长率由5.2%上行至15.2%,又下行至8.8%;1986—1990年间,GDP增长率由8.8%上行至11.6%,又下行至3.8%;1990—1999年间,GDP增长率由3.8%上行至14.2%,又下行至7.6%;1999—2014年间,GDP增长率由7.6%上行至11.9%,又下行至7.4%。历数这些经济周期可以发现三个特点。一是周期由短周期过渡到长周期。1979—1981年的周期只有3年,而1999—2014年的周期已长达十多年。二是周期内波峰与波谷的差额越来越小。早期经济周期波峰与波谷间的差额高可达近10%,而随后经济周期波峰与波谷间的差额

越来越小,1999—2014年间该值暂为4.5%。三是周期内上行年数少于下行年数。结合这些特征判断,我国宏观经济目前还处于1999年以来的下行区间,这给经济增长稳定在7%左右带来了压力。

2. 调整风险。结构调整是此次中央所界定的经济新常态的另一个主体内容,这是由我国长期坚持走数量扩张道路造成的。结构调整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产业结构调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经济增长使我国发展出规模庞大的第二产业,甚至被誉为“世界工厂”,但这是一个处于产业链底部的世界工厂,它不仅导致我国产业扁平化,而且还严重抑制我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2](P375)}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现阶段的服务业主导型产业结构被认为是后工业化阶段和现代化阶段的最优产业结构,其实际产值已占到美国GDP总量的80%。^[4]二是增长方式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结构具有一定关联性,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也就意味着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在这种增长方式下,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较低,经济增长依赖于资本、能源、原材料以及劳动力的持续投入,但现今我国要素投入都已陷入瓶颈,粗放型经济增长变得不可持续。三是地区结构调整。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也呈放大趋势。2013年,西部12省市生产总值合计为12.6万亿元,只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20%;而东部10省市生产总值合计为32.2万亿元,占全国的51%,其中最高的广东省为6.2万亿元,比最低的西藏807亿元高出77倍。这三个方向上的结构调整显然是非常必要的,而经济运行的惯性和既得利益的自我保护,甚至稳定经济增长的需求本身,都会加大结构调整的难度,从而使调整具有一定风险。

3. 环境风险。环境恶化已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所付出的显著代价,由此所带来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具体表现为:一是结构型环境风险形势严峻;二是布局型环境风险十分突出;三是安全事故、遗留隐患、长期累积型环境风险加大;四是人口增长、消费转型和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型环境风险逐步显现;五是全球性、跨国界环境问题带来的外部环境风险威胁不断增大;六是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环境风险影响深远。^[5]虽然环境保护的议题由来已久,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即便是发达国家,在宏观经济已实现起飞后,还是会通过向发展中国家

转移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或直接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有害垃圾来转嫁环境风险,说明我国所面临的环境风险将是长期性的。

4. 债务风险。2011年,审计署发布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占当年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25%;^①2013年,审计署再次发布的公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上升为178908.66亿元,占当年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28%。另外,2013年的公告还显示,若计入中央政府性债务,则全国政府性债务总计为302749.7亿元,占当年GDP总量的53%。^②综合这些数据来看,无论是总量上还是增长速度上,我国政府债务问题都较为突出。再考虑到地方政府出于稳定经济增长而衍生出的强烈的资金需求,未来我国的债务风险是很大的。

三、我国宏观经济面临风险的总体特征

对任何一国的宏观经济而言,出现经济风险是正常的,但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就面临更多风险,这是由我国特殊的国情所致:“中国这个政治实体,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要大……在这个实体内,既有农村地区的贫困与文盲,又有能够安全地将人类送入太空的雄厚财力与实力。这是一个同时走矛盾的两个方向的国家,既有机制改革和自由化,又同时存在新兴社会力量 and 法制”。^{[1](P209)}故结合我国国情,归纳现阶段经济发展所面临上述风险的总体特征,对做出科学的应对决策至关重要。

(一) 风险总体可控

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谈到我国所面临的经济风险时认为风险总体可控,这个判断是准确的。第一,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基本格局未变。近些年来,很多学者把中国经济的崛起比作是过去日本和西德的崛起,但实际上“中国崛起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强权的崛起在于,中国是以13亿人口进入了世界市场,如果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势必将创造无可争议的世界最大市场的地位,将创造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和世界上最庞大的消费群体”。^{[6](P3)}与此评判相似的是,林毅夫在谈及中国在未来10年、20年、3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这一问题时,也根据比较推算中国应当还有维持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7]故经济新常态所强调的7%左右的增长率虽然低于我国前三十多

年10%以上的增长率,但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依然是较高的增长率。也就是说,经济新常态是针对我国实际提出的对宏观经济增速下行的一种适应,即要从高速增长下用经济增长抵消其他问题的单一发展观转变为适度增长下的经济增长与其他问题相互协调的全局发展观,当然经济增长依旧是解决各种问题的前提条件。第二,世界各国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不变。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极其复杂多变,这其中既有因美国为维持霸权地位而对中、俄等多强国家进行的打压干扰,也有因人类现有发展模式所引发的环境、能源等全球公共危机的加剧,这些危局反而促使各国深刻认识到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正像兰德斯谈及当前的国家竞争时所评价的:“由此而来的唯一教训,是必须不断努力”。^{[8](P571)}第三,国内认识清晰。无论是决策层还是学术界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轨迹都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以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例,会议对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和特征都进行了详细说明,并把2015年的主要经济任务总结为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和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五个方面。换句话讲,经济新常态之所以“新”,是我们改变了旧有的“只要经济增长率”的观点,转而开始强调并研究“经济怎样实现增长”、“经济增长的效率与效果如何”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毫无疑问,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会有力促进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从而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以降低风险。

(二)国际风险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越来越大

纵览上述宏观经济面临风险,其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国际风险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越来越大。出现这种情况的缘由有三。一是我国宏观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提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还不足10%,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现今已超过60%。对外依存度的上升说明我国宏观经济已由封闭经济逐步走向开放经济,它虽与经济风险没有必然联系,但开放经济本就为风险的传导与积累创造了条件。二是全球化影响。现代市场经济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商业文化:“它使整个世界都处在商业化的驱动之下……在这一体系中,经济对其余的文化来讲具有无形的作用,并象征性地成为一个自治的实体,经济增长被看做人类福祉的本质……由此而形成的商业社会更是把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看做生活的意

义”。^{[9](P17-19)}遗憾的是,随着西方文明的占优,这种商业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毫无阻碍地迅速展开,消费开始有组织超越国界,一国经济增长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界之外的影响。三是一超多强下的大国博弈格局。国际风险之所以能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当今一超多强的大国博弈格局。尤其是对超级大国美国而言,维持其霸权地位中最重要的一个变量就是正在崛起的中国:“中美竞争不应成为下一场增长、霸权、扩张、延伸、冲突和衰落的案例。当然,这中间存在危险:不断增长的中国力量可能使得中国偏离它当前的目标,这一倾向必须有所防范。另一个危险在于当前主导世界的大国,最典型的是日本和美国,以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与各国自身国家利益之间是零和关系。这种危险可能导致外部环境的改变,可能逼使中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有所反应,从而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第三大危险是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特别是经济力量的扩张,将导致大量的溢出效应,从而引发冲突”。^{[1](P229)}在这样一种主观认定存在威胁的意识背景下,中美间围绕着能源、安全、货币与信息所产生的摩擦在一定时期内会加剧,我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国际风险自然加大。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作为上升期的新兴大国中国和膨胀期的超级大国美国出现摩擦既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在促使中国成为稳定国际关系重要一环的同时,也可让美国逐渐系统化看待中国力量的增长。

(三)风险相互之间影响越来越大

从长期来看,某种风险能否演化发展到影响宏观经济的整体面貌还取决于其他风险的演化发展情况,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风险的又一个显著特征,即经济风险相互之间影响越来越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经济增长下的需求多样化。现代经济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经济体,其增长源泉主要来自各种各样的需求。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培育出差别较大的行为主体,而每一类行为主体都有各自不同的目标与需求。这些多样化需求的叠加往往也会造成风险的叠加,如地方政府从刺激经济的需求出发,会主动吸纳更多资金以扩大生产规模,这会产生债务风险。但与此同时,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又会对环境产生更多影响,这与民众追求生活质量的目标往往相悖。而且扩大规模后的我国经济必然会与外界产生更为广泛的经贸联系,这客观要求人民币发挥更

大作用,但这种要求又可能被美国解读为潜在威胁而对人民币进行干扰打压。二是现代宏观经济的复杂性。现代宏观经济是一套极为有效的运转体系,科斯塔甚至将其描述为极端经济学:“它的结果是通过操纵资源、人力和市场,使生产效率、企业制度化以及增加效益的复杂方法都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它一手掀起了电子、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方面的革命”。^{[10](P148)}但取得如此高效的代价就是现代宏观经济体系越来越趋向复杂,产量、需求、进出口、流动性、货币、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等等各种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既是可能诱发经济危机的单个风险因素,同时也是内涵于宏观经济体系内的一个组成部分。三是发展成为世界性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谈到风险问题是有深刻时代背景的,当今世界正处于风险凸显与加剧时期,“全球气候变化、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团伙暴力、持续的宗教战争,我们的行动顶多只是缓解短期的症状。随着我们的问题代代相传,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难解决……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复杂性加速升级,知识变得难以获得”。^{[10](P17-23)}因此,发展中存在的很多风险不仅仅是我国需要克服的风险,亦是世界范围内各国所面临的正在不断深化且纠缠在一起的系统性风险,如何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性问题。

四、我国宏观经济风险的应对措施

(一)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

不管怎样,减缓乃至消除当前风险的前提条件依旧是宏观经济实现增长,与之前的看法不同的是,这不是用数量换质量的过程,而是在发展中获得解决问题的空间和能力。以国际风险为例,为了使美国认识到有必要与我国保持接触、通过合作来解决双方的摩擦,就需要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竞争格局中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并努力使之透明化。至于各类国内风险,更需要各级政府集中财力加以防范与化解,而这些都需要我国宏观经济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保持7%左右的稳定增长。而且深入来讲,我国宏观经济依然具有两个内在特点。一是赶超经济。近些年来我国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凸显使很多人开始质疑我国的经济赶超之路,应该说,太热衷于赶超发达国家、经济总量排名上升的意义是不大的,但追赶甚至超越我们曾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当前全球风险不断积累并深化的时期,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做后盾,就很难专心解决国家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问

题,更无法在国际秩序变革过程中表达公正的看法和维护正当的权益。二是人均弱小。从个体发展角度来看,我国宏观经济还是非常弱小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13年我国人均GDP只有6767美元,世界排名90左右,为人均第一国家的6%。如此低的人均GDP很难给个体提供好的发展环境和机遇,更不用说消除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各种风险。故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还是我国应对当前风险的首要措施。

(二)加快结构调整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加快结构调整。其实,我国宏观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显现得比较早,以产业结构为例,我国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加工业在国际竞争中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市场和竞争压力,获取的加工利润很低,亟需加以调整和提升。但2007年的金融危机延缓了我国结构调整的步伐,更重要的是,增长方式的转换、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地区结构的均衡都意味着现有利益格局将被打破,相关社会问题将会因此加重,调整的难度可想而知。今后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来进行结构调整。一是统一认识。我们应认识到,中国必须实施对自己最有利的发展战略,哪怕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也是中央强调经济新常态的原因之一。从这个角度讲,当前风险的聚集反而有利于结构调整工作的开展,应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释放我国规模依然可观的增长潜力。二是强化社会保障工作。在统一认识的同时,我们还应强化社会保障工作,以应对结构调整过程中产生的失业人数增多问题。可以预见的是,结构调整所引发的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是失业人数的增多,应通过扩大再就业培训、提高城镇居民医疗保险、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等措施,为调整中的失业人群提供更多生活保障。三是做好地区协调。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地区发展差距,既是结构调整的内容之一,也为结构调整提供了实施梯度,应从全局利益出发,做好区域间的沟通与协调,使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在地区结构调整的大框架下整体进行。

(三)增进国际合作

除自身有效应对外,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风险是否危及经济体本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风险的演化发展。故增进国际合作,寻求我国经济增长所需外部和平友好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而

其中的关键自然是中美关系。未来的中美关系究竟会怎样发展?“对中国来讲,与美国的分歧是必然的,激烈的冲突则是可避免的,两国将会合作,因为共同利益驱使两国合作”。^[1](P221)]客观评价,这段话是非常中肯的,2014年,美国GDP总量近17万亿美元,中国GDP总量近10万亿美元,两国合计占世界经济总量35%以上,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使全球范围内任何经济风险的防范与化解都离不开中美间的经济合作。我们应继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构建与革新,并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开展充分的经济合作,共同致力于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融合经济增长与公共伦理建设

一系列风险的显现与聚集反映出当今世界包括我国在内对经济增长的认识过于单一,“自1945年以来,联合国和主要国家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认为更大程度上的经济增长才是解决世界问题的最好办法……到20世纪末期,随着贫穷持久化和环境问题增多,经济增长最大优先权可能不是世界的最好出路这一点变得日益明显”。^[9](P242)]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之路无疑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传统的经济增长最大化路径是不可持续的,未来的经济发展,不仅要有增长,更要有对人文价值的崇尚、幸福生活的追求和良善管理的实践。故若想从长期化解各类经济风险,就需要把经济增长与公共伦理建设结合起来,在增加数量的同时统一价值观、促进民生发展和提升管理水平,从而建立起

从个体到政府的有效风险防范与共担机制。

注释: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2011年第35号公告,http://www.audit.gov.cn/n1992130/n1992150/n1992500/2752208.html。
-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2013年第32号公告,http://www.audit.gov.cn/n1992130/n1992150/n1992379/3432165.html。

参考文献:

- [1] [美]戴维·蓝普顿.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M].姚芸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 [2] 黄树东.选择和崛起:国际博弈下的中国危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3] 张煜.战后美国霸权的经济实质及其未来——重读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启示[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1,(6):59-63.
- [4] 张辉,丁匡达.美国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1975-2011[J].经济学动态,2013,(7):140-148.
- [5] 王芳.转型加速期中国的环境风险及其社会应对[J].河北学刊,2012,(6):117-122.
- [6] 刘涛.中国崛起策[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
- [7] 林毅夫.21世纪全球多极增长格局中的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1):21-28.
- [8] [美]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M].门洪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 [9] [美]约翰·博德利.人类学与当今人类问题(第5版)[M].周云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10] [美]丽贝卡·D·科斯塔.即将崩溃的文明[M].李亦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许桃芳)

Study on Risk and Countermeasure of the Macro-economy in China

WANG Qing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Tax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Gansu 730020, China)

Abstract: At the end of 2014, CEWC interpreted nine characteristics about economy's New Normal, including economic risks accumulation problem under the downward of Macro economic growth. If we induce these economic risks, there exist international risks in energy, safety, currency and information and domestic risks in periodicity, adjustability, environment and debt. They have such features, that is increasing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risks and developing systemic risk but all can be controlled. So, we should prevent and resolve these risks through maintaining stable growth of Macro-economy, speeding up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mbining economic growth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ethics.

Key words: macro-economy; economy's new normal; economics risk